

北海文史

第五辑

京华旧梦录(之三)

——浏阳河上遇险记 欧阳蓬口述 鹤鸣记录整理

上海“一·二八”抗战后，我离开十九路军，又回到陈铭枢处当侍从副官，后随陈铭枢参加了“福建人民政府”的成立活动。1934年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，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乘飞机到桂林（一说到香港——记录者注）；陈铭枢、黄琪翔不敢坐飞机，由我没法通过熟人关系找了一辆小汽车，雇了一名司机由泉州驶到龙岩。我们准备由龙岩换乘小艇走水路下大埔，这时发生一件小事。在我们弃车乘艇之际，司机准备卖掉汽车将车款归己，说若不准卖就放火烧掉它。我掏出手枪捐着他厉声说，这车不准卖也不准烧，留着以后公用，你若烧掉这辆车我就杀了你。陈铭枢在旁听了我俩对话，很赞许我爱惜公物的品行。我随身带的那支手枪，陈曾劝我丢掉，我都不肯，想不到在对付这名司机时起了点威慑作用，后来一下艇，我还是遵从陈的意见把枪丢下江中。从龙岩下艇，通过曲折的内河水道向大埔驰去。途中，我上岸买菜，用沈载和行长发行的广东纸币；陈、黄二人则自己煮饭。经一天一夜到达大埔。从大埔登岸经陆路到汕头。汕头有陈的旧部招呼，到达当天下午即登上“济南号”轮船驶抵香港。“因行动秘密，抵港时无人知晓。在香港一住几年，为了躲避国民党蓝湊社特务的跟踪，陈经常变换住处，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。经常在一起开会碰头的有李济深、蔡廷锴、蒋光鼐、徐桂龙、余心清等人。

“七七”芦沟桥事变后，举国上下一致抗日，共赴国难，蒋、陈消除前嫌，陈奉蒋召至南京任军委会上蒋参议官。我随陈住在南京山西街一栋三层洋楼，陈住二楼，我住三楼。当时我通过熟人关系又找了一辆汽车。上海“八·一三抗战”前夕，我曾随陈铭枢、蒋光鼐乘车到上海视察，后来陈说上海一战真是失策，死了很多人，伤了军队元气。南京沦陷前，蒋介石派了一排宪兵去保护

陈铭枢，准备撤退。我对陈说，不要蒋的宪兵，招呼起来太麻烦，只要有汽车就行了。陈后来是先我乘车撤退往长沙的，我自己则通过军委会某科科长姚琮（浙江奉化人），由他派了一部汽车给我，储备十几箱汽油，找了司机。正在这时候，田汉知道我有汽车便来找我，说他有个弟弟，请我携同他一起撤退，我自然应允。离开南京时，听说下关已失守，死尸堆积如山。我与田汉弟（忘其姓名）、司机三人乘此小率经安徽、湖北进入湖南，约一天多时间已驶抵湖南的浏阳河畔。当时已是初冬天气，颇有寒意，我身穿一件大褸，带了很多纸币。司机开车太猛，一头扎进浏阳河中，差点就淹没汽车，只露出车顶。司机自知责任重大，抢先打开车门涉水登岸逃走。幸亏我水性好，反应也很快，一手执住田汉弟就拖上岸来。当时俩人冷得直哆嗦，围观的乡民很多。我对乡亲们说，我出两百元给你们，先找些柴火来烤暖身；又出三百元请他们帮我拉车上岸。重赏之下有勇夫，很快柴火取来烤暖了身，汽车也拉上岸来了。我马上到公路上拦车，让司机到长沙传话给陈铭枢（并告知陈的座车车牌号码），就说我们在浏阳河遇险，田汉听说弟弟遇险并获救，跑来很感激地对我说：“欧阳副官真好，救了我弟弟一命，真不知怎么谢你才好，又没有东西送你，……”我说：“你就写几个字送我吧！”他很高兴地答应了。第二天就亲笔写了一个条幅送我。时隔多年，条幅内容已忘记了。我收到田汉条幅后，对他说，郭沫若的字我也喜欢，你能否替我求他写一幅？他说可以，“我跟郭沫若很熟的。”果然没过几天，田汉又把郭沫若写给我的条幅送来了。此外李济深等也有字送我。以后我回到广州，日本人攻广州时，这些字画及全部行李都失了，至今回想起来，真是可惜得很。

在长沙，我随陈铭枢住了十多二十天，又撤到重庆。1939年陈继续当他的上将参议官，每月600—700文工资，蒋光鼐另有收入，把自己那份工资全给了陈。我当时是上尉副官，每月80元，也过得很富足，可以雇一个工人服侍自己了。在重庆住了一年多，我思乡心切；又目睹耳闻蒋介石诛杀无辜的行径，心灰意冷，向陈提出辞职返乡的要求，陈不让我走，故意躲起来不让我见面。我

一意孤行，自作主张不辞而别。想不到这一别就是16年！1955年陈铭枢回乡视察，我抱愧地去找他，内人却说，你有脸去见他？他怪你不辞而别呢！我到北中找陈铭樵校长，陈铭樵说你不用找他，他去溇洲回来自然去找你。果然后来我们见面了。一起去海滨游泳，陈还夸我的水性好，说在浏阳河时你竟能一手拽住田汉弟游上岸，真不知道你水性这么好；还夸我人品好，汽车也拉上岸。不使损失留给当地政府。

我年近八十，已入耄耋之年，疾病缠身，来日无多，记忆力严重衰退，但五十年前的往事却深印在大脑中，经记录整理为文，姑取名“京华旧梦录”。追述这些往事，不过为后人修史编志留些鳞爪，记忆不及乃至有误在所难免，仅供参考而已！

1987年于北海故宅